

引领前进方向 凝聚奋斗力量

——重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研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点体会

邢责思

在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重要进程中,我们迎来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0周年。《讲话》和《决定》分别针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建设实践中的重大课题,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但同时,《讲话》和《决定》的基本精神又是贯通的。从《讲话》到《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建设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和我们党对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政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正如《决定》所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新新成果、文化建设和文化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一

文化建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具有关键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地位。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为有机互动的完整系统予以论述,强调了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1942年,他又发表了《讲话》。对文化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地位作出重大论述。其基本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奠基性的地位和指导意义。同时,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对文化建设发表系统性的专门讲话,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开创性的举措。

一、“文武两个战线”同样“必不可少”的问题。对文化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充分认识问题,是能否进行文化建设的动力问题即文化建设的启动点问题。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以武装斗争为革命主要形式的历史时期,《讲话》将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相提并论,阐明文化建设的极其重要性,开宗明义指出:“在我们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要把文化“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将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作用的及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在全新的历史高度予以强调,在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站稳党性立场的问题。指导思想的问题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问题。没有正确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文化建设的路线就会发生根本的偏颇。《讲话》中十分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

三、文化建设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文化建设是通过提供人的精神力量来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作用的。面向什么人才能起到这种作用,自然成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和方向问题。《讲话》中明确提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讲话》首先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反复强调文化要为90%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特别是为最基层的工农兵服务。同时,《讲话》指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这里讲的“如何去服务”,指的是服务的根本方法,而不是具体的方法就是:“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

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决定了与人民群众最紧密结合的根本方法,这是《讲话》对文化建设最为卓越的理论贡献之一。

四、文化建设的社会效果检验问题。文化建设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在社会实践对人民群众产生的社会效果得以体现并得到检验,《讲话》中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同时,这种社会实践产生的社会效果的检验,应当是全局性的。《讲话》专门作出论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讲话》特别举例说明,“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出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五、文化建设的兼容并蓄问题,这是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开放程度问题或称作文化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纵向和横向联系问题。我国的文化建设在发展中,必须反对自我封闭的倾向,这关系到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在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海纳百川的壮阔胸襟。

二

当前,我们同样面临着在关键时刻发挥文化关键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性课题。《决定》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有机互动的系统完整论述,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建设的重大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形成了《决定》,对文化建设作出了专门的深入全面论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出了根本指导。由党的中央全会专门颁布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重大罕见的。《决定》不仅与《讲话》一样,体现了我们党在重大历史时期关键时刻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同时,其关于文化建设的许多重大论述,精神实质与《讲话》是传承和贯通的,又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讲话》作出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一、满足人民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并重的原则。这是新时期加强文化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根本方法。《决定》首先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反复强调文化要为90%以上的人民大众服务,特别是为最基层的工农兵服务。同时,《讲话》指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这里讲的“如何去服务”,指的是服务的根本方法,而不是具体的方法就是:“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

向、凝聚奋斗力量”。文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地位和作用,是由于它提供人民群众以精神力量。《决定》对此清晰地作出了理论表述:“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和深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才真正具有文化自觉性。《决定》的这种阐述,站在了新的历史高度,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为首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决定》和《讲话》一样,高度重视端正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问题。《决定》指出:“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首要内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讲话》特别举例说明,“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出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

三、以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要为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决定》继承和发展了《讲话》关于文化建设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和方法这一中心问题论述的基本精神。《决定》指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回答了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同时,《决定》强调,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人民在文化生活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回答了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要的根本方法问题。在结合学习《讲话》和《决定》的相关论述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讲话》强调文化建设面向占人口大多数的最基层群众,这也是《决定》所说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最基本要求。这一方向不能够改变,文化建设要在不同历史时期“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如果不面向占人口最多的最基层群众,不满足他们的需要,动员他们的力量,文化建设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就不能实现。

四、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及加强相应管理的原则。与《讲话》关于以最根本、最大社会效益对文化建设作出检验论述的基本精神相贯通的是,《决定》指出,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的根本和集中体现。文化建设要担负“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的根本作用,就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着眼于民族和国家的全局利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话》强调要坚持以最根本、最广大的社会效益作为文化建设的检验和归宿。《决定》强调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

五、全面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和加强文化国际交流方面,《决定》不仅继承了《讲话》阐述的深入开放性精神,而且极其系统全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的战略任务,这种文化开放的广阔度和纵深度,超越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将指导我国文化建设在兼容并蓄的开放性上,迈出前所未有的壮阔步伐。

三

时代的发展决定了理论的创新。今天,《决定》面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许多重大课题,是《讲话》面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文化建设所未曾面临过的,其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了过去的时代。因此,《决定》在继承《讲

话》基本精神的同时,必然会在回答文化建设新的历史课题的进程中,对《讲话》作出发展,即对我们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许多重要论述,形成了对《讲话》的重大发展,对我们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作出了新的宝贵贡献。

一、关于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与我国革命战争时期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项建设,固然需要发挥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但根本点是,通过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来焕发根本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启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航程时,就明确提出了要废止指令性的运动模式开展各项建设,这也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特色。我国的文化建设正是在这一根本特色的指引下,迈入了文化体制改革这一文化建设焕发活力的轨道。在已有基础上,《决定》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根本主题,作出了围绕主题的各方面论述,指出了“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这个根本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对文化建设作出的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二、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与我国革命战争时期不同的是,我们党已在一个有着世界最多人口的大国执政。人民的文化需要和其他需要一样,已不可能在行政管理体制下,充分了解和反馈。正如计划经济体制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除基本文化权益外的人民群众很大一部分文化需求,要通过文化市场反应和反馈,并通过文化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方式予以解决。这是推动文化建设和文化大繁荣的根本途径。《决定》对此作出了充分阐述,指出:“要创新商业模式,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扩大文化服务消费,提供个性化、分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正是要依据对文化市场的适应和反馈程度来予以判断优劣和推进。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历史性的转向是新的历史时期满足人民文化需要的新的方式,而不是文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根本方向的改变。同时,在纷繁复杂的文化市场中,继续把握人民的最根本最长远利益,坚持“文化建设”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考验。需要我们努力去破解这一重大的文化课题。

三、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与我国革命战争时期不同的是,文化建设面对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已在和平建设时期呈现出极其广阔繁杂的类型和层面。文化建设,已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笔耕,而需要成为人民群众都能从事的文化经济即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和反馈的人民群众极其重要的文化需求,只有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予以满足,而不能再通过指令性的文化建设来满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除公益性文化事业外,文化建设的大部分领域要走向文化产业。这一点也正是《决定》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创新性论述极其重要、极其突出的部分。《决定》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撑,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重要支撑。”如果说,我国经济正在推进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的话,发展文化产业,也代表着我国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基本精神的体现。因此,《决定》对发展文化产业作出的重大论述,为我们党的文化理论建设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

重温《讲话》,研读《决定》,进一步明确文化建设“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的地位作用和推进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性。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公民应当深刻意识到的重大使命。(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原总编辑)



于敬向本报记者讲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故事

5月17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编剧于敏在北京居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老作家前不久刚刚度过98周岁生日,身体仍然十分硬朗。虽然走路需要借助手杖,但是头脑非常清醒,说起7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仍能准确地回忆起很多的人和事,而且还不时地和记者来点小幽默。

于老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我在鲁艺戏剧系工作。当时,中央请胡乔木负责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们发出47份请柬,我的名字不在这47人的名单中。5月2日那天,是个星期六,我和于学伟在鲁艺驻地的东山上散步,碰到我们的院长周扬同志从山上下来。他招呼我们跟他一起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座谈会。这样,我们两个‘小沙弥’,跟着我们的院长就去了。这个会,就是意义深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记者问:“从鲁艺驻地到杨家岭多远?你们是走着去的吗?”

于老说:“大概10多里吧。你要是给我们派个汽车,我们就坐着去。”说完,就笑了起来。据他介绍,会议开了三次,是在1942年5月的2日、16日、23日这三个星期六的下午召开的。前两次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后一次因为人更多了,就挪到室外土坪举行。

于老说:“好多记者问我那个会是怎么开的,主席台是什么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既没有献花,也没有主席台,更没有什么桌牌,安排什么座位。大家随意散坐,不拘一格。中央大礼堂是一所瓦顶砖墙的大棚子,靠墙靠窗摆了一些小方桌,四边有长凳,礼堂中央也摆了一些长凳。我坐在一张短凳上,旁边就是秦邦宪同志,不远处就是朱总司令,他们都跟大家坐在一起。听会的时候,秦邦宪还跟我一起‘咬耳朵’呢。”

记者问:“当时都是5月了,怎么从照片上看还有人穿着棉衣服呢?”

于老说:“我们延安有一句话,叫‘早穿棉衣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那里的昼夜温差很大。我们去开会穿着单衣,同时也带着棉衣。毛主席在会场中间的一张放了白布的桌子前面讲话,他也披着一件棉衣,我记得那天的棉衣都磨破了,露出了一团棉花。毛主席入场时我们全体起立。他绕场一周,和我们每个人都握手。主席握手时亲切地注视着对方,对每个人都表示尊重。”

“毛主席讲话时一直站着,他的开场白在发表时标为《引言》。他一开始就列举5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说实话,我只泛泛地听着。只在讲到他自己的感情变化时,我动心了。他说自己是学生出身,养成一种习惯,在大家面前挑自己的行李,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在这时,我才真正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一层牛屎……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记者问:“会上作家们是怎么发言的?您发言了吗?”

于老说:“在这么多要人和名人面前,我没有发言的胆量。不才如我,听发言倒还能分辨是非高下。平心而论,一部分发言颇有见地,言之有物;有些发言则水平不高,颇为空洞。有位作家说,巴尔扎克虽然有保皇思想,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客观上还是揭露了贵族社会的没落和腐朽。意思是说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可以不一致。秦邦宪同志听后就悄悄跟我说:‘如果巴尔扎克的思想立场不是保皇派,不是更好吗?’还有一位水平很高的歌唱家在会上提要求说,为了保护声带,他每天需要一磅牛奶、两个鸡蛋。另一位东北籍作家说他需要吃肉,叫号是骡子是马遛遛看,意思是他不但要争中国第一,也要争世界第一。朱总司令劝告他说:‘不要眼睛向天,要看得起工农兵。你要当状元,可状元不是自封的。新时代的状元要工农兵来点。’”

记者问:“5月23日这天的会开了多长时间?”

于老说:“这一天来听会的人较多,就移到外面的土坪上。毛泽东主席手里拿着一个提纲,洋洋洒洒地讲了3个多小时。后来天晚了,就点起汽灯继续开。汽灯就是烧煤油的灯,很亮。会开完大概是晚上8点钟吧。开完会全体留影,也是在汽灯照明下拍的,所以现在看照片上我的脸比较黑。正当我们准备好合影的时候,忽然跑来一条狗‘凑热闹’。毛主席起身一边赶狗,一边幽默地大喊:‘康生!你怎么不把它管好!’康生是管社会部的,所以主席这样说。全场全都笑了。”

记者问:“您认为《讲话》的精髓在哪里?”

于老说:“《讲话》中提到的‘为群众,如何为群众’,这是主旨,条分缕析的所有论点都是围绕和阐明这一主旨的。在学习这一文艺经典时,我尝试归纳出8个方面的问题,借以加深理解和便于记忆。一是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的关系。文艺事业再神圣,也是全部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可颠倒,不可替代。文艺有其特殊规律,可是决然不可超乎革命的、即人民的利益之上。这就和‘文艺至上’‘文艺超功利’划清了界线。二是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只有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才能表现他们,感染和启迪他们。人民是文艺的出发点和归宿。‘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精神必须发扬。三是文艺创作与生活源泉的关系。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开源才能物流,才能汪洋恣肆,天马行空。脱离人民生活,任何天才必然变成庸才。这就和‘唯灵感论’和‘主体意识论’划清界限。四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群众首先需要普及,跟着也就需要提高,所以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五是创作与借鉴的关系。吸收中外古今的一切优秀遗产,为的是创作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不可忽视遗产和盲目地吸收都不对,所以应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六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律的最先进的科学,当然也是认识文艺创作规律的科学。表现的深刻依赖于认识的深刻。世界观的明确决定着艺术头脑的明彻。七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政治涵盖艺术而不代替艺术。艺术不是政治和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但也不能脱离革命的大方向。八是文艺界的团结和统一战线关系的问题。对共产党人的要求应更严格,在社会实践和创作实践上,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于敏积极地投入到群众中去,到沸腾的生活海洋中去。东北解放后,于敏首先写下了哈尔滨一机车辆厂体验生活,并利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剧本《桥》,反映的是工人同志们克服困难、支援解放战争的故事。剧本很快被拍成电影,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此后,于敏又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写出另一部电影剧本《赵一曼》,将这位东北抗日英雄的事迹搬上了银幕。后来,他们夫妻抱着尚不足两个月的女儿到鞍山落户,并且还担任了鞍钢轧钢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从此在鞍山生活了20多年。在这里,于敏除了参加生产,还同女作家草明等人一起办工人文化学习班,并为自己定下了两条要求:“有求必应”和“送货上门”,鞍钢的孟泰、王崇伦、王秀兰等等全国劳模和工人同志们都和他结成了终生的好朋友。他在鞍山培养的青年作者李云德等等也拿出了《沸腾的群山》等一大批好作品。他创作的《高尔基传》、《炉火正红》、《孟长有》、《平常女人的故事》、《我们是一家》、《第一回合》等剧本和小说,都得益于这深厚的生活积淀。请您谈谈对今天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建议。他说:“生活的土壤越深厚越好。深入生活不是简单的采风,是要真正到生活第一线去。生活深入得怎么样,我们有一条关键的标准,就是群众是不是把你当成他们的自己人。只有群众不把你当成特殊人物,而是真正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才会跟你掏心窝子。另外,就是希望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多读些书。通过我的一些接触来看,某些同志书念得太少,甚至非常无知。比如《尼伯龙根之歌》和《伊戈尔王子远征记》等等,各种古今中外的好书,都要下功夫攻读。深入生活和读书,二者不可偏废。”

记者最后问:“于老,您年近百岁,身体还是这样好,请问您在养生方面有什么秘诀?”

于老说:“12个字:起居有时,饮食有节,乐观达观。”

本报记者

高昌

文图

生活土壤越深厚越好

——访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著名作家于敏

本报记者

高昌

文图

文图